

# 独立阅读

2008 年 1 月

##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阅读报告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阅读报告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阅读报告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 5、阅读报告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阅读报告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阅读报告小组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写作：戴新伟（广州）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书评人：**羽良（北京）、严飞（香港）、莫之许（北京）、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张昕（美国·洛杉矶）、刘柠（北京）、汪伟（上海）、沈展云（广州）、马慧元（美国·温哥华）

**翻译：**陈丹丹（南京）

## 编者按:

遥远的 2008 年就这样到来了, 让人猝不及防。因为奥运会、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大跃进五十周年)等等, 这是被赋予很多想象的一年, 但想象能否变成现实, 或者想象变成现实之后怎么办, 这是我们无法预言的。

还有一些人永远见不到 2008 年, 2007 年 12 月 5 日正午时分, 余虹先生从 10 层高的楼上滑翔而下。崔卫平女士在悼念文章中写道: “我们互相之间的阅读太少了。”是的, 这不仅发生在生者和逝者之间, 也存在于生者和生者之间, 不仅发生在陌生人之间, 也存在于朋友和朋友之间。如果朋友们能够通过互相阅读发现对方陌生的一面, 如果陌生人能够通过互相阅读成为朋友, 如果“独立阅读”能够促成“我们互相之间的阅读”, 如果这些不仅是如果, 那有多么美好啊!

## 目录

###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

戴新伟: 写作  
苏小和: 经济  
成庆: 思想  
王晓渔: 文史

### 书评

---

张昕: “资本的秘密”还是“资本的难题”?  
刘柠: “下流”, 怎么了?  
马慧元: 纽约客八十年  
费长房: 又走了一个, 唯一的一个  
成庆: 大提琴是首青春的歌

### 译介

---

韩太云: 中国龙+印度象=全球经济新霸权?

### 影像

---

汪伟: 论摄影(三)

## 独立阅读 2007 年度推荐候选名单

评选规则:

1. “独立阅读”评选 2007 年度推荐出版社、作者、图书和传媒, 期待您的参与, 请于 2008 年 1 月 25 日之前将您的选择发至 [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 每项既可单选也可多选, 如果您都不满意, 也可以另外提供选择。为了保证选票的公正性, 只有 2008 年 1 月 1 日之前订阅“独立阅读”的读者具有投票权。

2. 候选对象需在 2007 年度具有特别表现, 选项排列不分先后顺序。

1. 年度推荐出版社候选名单:

- A. 新星出版社
- B. 上海译文出版社
- C.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D. 华夏出版社
- E. 江苏人民出版社

2. 年度推荐作者候选名单:

- A. 帕穆克
- B. 李零
- C. 曹乃谦
- D. 林达
- E. 俞可平

3. 年度推荐图书候选名单:

- A. 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 三联书店, 2007 年 1 月;
- B. 陈丹青:《退步集续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4 月;
- C. 桑格格:《小时候》, 新星出版社, 2007 年 5 月;
- D. 李零:《丧家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5 月;
- E. 张纯如:《南京浩劫》, 杨夏鸣译, 东方出版社, 2007 年 8 月。

4. 年度推荐传媒候选名单:

- A. 《读库》
- B. 《炎黄春秋》
- C. 《读书》
- D. 豆瓣
- E. 牛博

## 中国独立阅读报告

### WRITING 写作

观察员 戴新伟 (广州, yukon1944@yahoo.com.cn)



自从2007年6月开始参与“中国独立阅读报告”的写作板块以来,个人阅读不免战战兢兢——无他,沾了报告两字,总觉得必须告诉别人一些什么,必须正经起来,况且这年月读小说是一件累人的活,尤其是现在的作家似乎除了长篇就不会写小说了,越著名的小说越厚。我要写韩寒的《光荣日(第一季)》(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年6月)很好看,又担心读者鄙视这个报告。好在如今盘点起来,厚重小说统统如烟往事,只留下好看的小说让人立马想起。

如果有所谓最好看或者不忍释卷之类,当选高木直子的漫画和劳伦斯·布洛克的“马修·斯卡德侦探系列”小说,两套书其实2006年就在出。高木直子大概是较少能够在作品里力陈自己是平常人的创作者(大部分人恰恰相反),她的漫画又笨拙得很,故事也日常,却就是有种让人非常喜欢的东西。日本这样的漫画大国,到如今单技术与想像力不知已经先进多少倍,然而却还是有高木直子这样的画家畅销,绝对是个有意思的话题。2007年还读了几本台湾木马公司出的日本武侠小说,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藤泽周平的长篇《蝉时雨》和两部短篇集《隐剑孤影抄》和《隐剑秋风抄》。

喜欢看山田洋次导演的《黄昏清兵卫》的人,应该也会喜欢上藤泽周平的小说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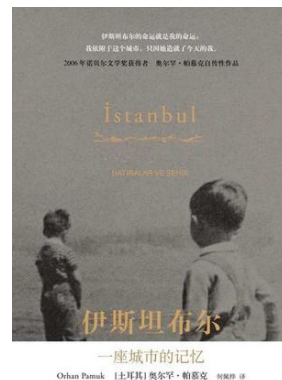
如果有人因我去看《蓝莓之夜》觉得我是王家卫粉丝,那就大错,必然是因为劳伦斯·布洛克!自从我去年读了《八百万种死法》(新星出版社,2006年)之后,简直有了“好在雷蒙·钱德勒和约翰·勒卡雷之后还有人可以读”的感觉。关于侦探/推理小说,关于畅销,关于类型小说的写法,关于严肃文学与流行文学等等,劳伦斯·布洛克能够提供不少值得一谈的样本。可惜今年只读了他的《黑暗之刺》(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和《刀锋之先》(新星出版社,2007年2月),我最关心的就是他这套“侦探”系列什么时候出完,“雅贼”、“杀手”和“密探”系列又何时动工。相比之下,台湾十年前就开始出了,原来任职脸谱出版社的唐诺先生为劳伦斯·布洛克写过很好的导读;侯孝贤送给梁朝伟的书也是此人的。

只是,在我巨大期待之余惟一的要求,是劳烦出版社在印刷劳伦斯·布洛克之前能否校对一下,不要让读者一边当读者还要一边当校对,还觉得对不起劳伦斯·布洛克。

另外一个期待当属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自传《剥洋葱》。自从他踢爆曾加入纳粹党卫军以来,这洋葱也剥得够久,终于听说下个月译林出版社将出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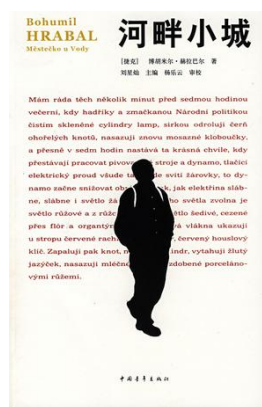
四月底参加重庆全国书市,正好曹乃谦的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4月)出简体字版。这本书应该很多大陆读者找过2002年台湾天下文化版,好歹现在有了大陆版。其实从2006年年底开始,曹乃谦的小说已在陆续出版,包括《最后的村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部落一年》(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年)和中篇集子《佛的孤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7月)。就以现在的文学潮流、文学口味乃至文坛格局,曹乃谦和他的小说都是中国文学有趣的现象。我个人很喜欢他的中篇小说《换梅》。

2007年无论如何都要谈谈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谈这位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少有点锦上添花的嫌疑,其实早在他出大陆版之前,我读了台湾麦田版,也早在他得奖之前的两个月,我所在的南方都市报已经做了大篇幅的评介。我不讳言非常喜欢《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007年翻译出版的长篇小说《雪》(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也好,但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这部回忆录(此书的版权信息注明是长篇小说,不知何故)和其他著名作家的回忆录不一样之处,在于它探讨了作家、作品与出生地的关系,尤其是一生居住的出生地。帕慕克几近平静叙述下的热爱与厌憎非常强烈,也非常打动人。在另外一部回忆录,德国文化史家尼古劳斯·桑巴特的《海德堡岁月》(刘兴华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5 月)里, 我则喜欢他貌似玩世不恭、“花花公子”态度下, 极其认真刻苦的一面, 这一面还是整个战后德国新青年的, 反省精神与承担态度在今天是多么的缺乏。我觉得, 这两本书都是 2007 年被低估的作品, 至少, 提及的人太少, 而大部分评论文章都太例牌。

关于德国文学, 2007 年也不乏大事件的带动, 如汉学家顾彬论及德国文化现状的访谈, 如参加 BIBF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的德国新作家们, 所以读了《延森先生遁世记》(雅各布·海因, 吴晓樵译, 新星出版社, 2007 年 4 月) 和德国新小说家们的集子《红桃 J: 德语新小说选》(克利斯托夫·彼得斯等, 丁娜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年 8 月), 了解到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德国作家之与格拉斯们的不同。在一位美国小说家林·拉德纳那里, 《有人喜欢冷冰冰》(孙仲旭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8 月) 则代表了上世纪初美国短篇小说的大体形态以及未来突破——关于后者, 说不定在明年就能看到——《译文》杂志刊登了美国六七十年代短篇小说家理查德·耶茨的小说。



乔治·奥威尔的《缅甸岁月》(李锋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8 月), 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钟志清译, 译林出版社, 2007 年 8 月), 黄灿然翻译的《巴列霍诗选》(华夏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 卡赞扎基斯的《中国纪行》(李成贵译, 译林出版社, 2007 年 10 月), 富恩特斯的《我相信》(张伟劫、李易非译, 译林出版社, 2007 年 8 月), 等等, 都是 2007 年外国文学的重量级, 但我都耽搁在了赫拉巴尔的回忆录《河畔小城》(万世荣等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年 9 月) 里面了。前面几页有点艰难, 过了之后就泥足深陷, 哪怕读一点就少一点, 仍然不能自拔。不知道赫拉巴尔会不会在意别人评价他伟大, 读者之一的我, 只是觉得他代表了一种“比加西亚·马尔克斯淡一点点的自由”。迄今为止我虽然还没有读完, 已经打定主意这是 2008 年重读的书, 说不定还是以后都会重读的书——正如佩索阿。2007 年在重庆重读《惶然录》(韩少功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年), 一直到七月才读完。对我来说, 佩索阿是常读常新的。另外一个较大的重读工程是关于加缪的, 读了王安忆有关散文的读书随笔之后, 我把加缪找了出来,

这一次发现以前读的等于没有读(早年, 我心目中的加缪就等于艰深)。从他的散文集《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 再到四卷本《加缪全集》(柳鸣九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的两卷随笔, 再回到小说。要感谢这两位, 是他们让我找回了对散文的信心, 包括如何去看待散文的眼光, 以及如何看待散文与随笔。

2007 年认真读完的诗集是米洛舒(即米沃什)和意大利诗人帕韦泽以及希腊的黎佐斯。米沃什诗集是台湾远景“诺贝尔文学奖全集”之 50 卷, 包括 1979 年到 1981 年的三位获奖作家伊利提斯(又译埃利蒂斯)、米洛舒和卡内提。米沃什的诗集也有国内译本, 但我还是更喜欢这个由杜国清翻译的版本, 杜国清也写诗, 我没有读过, 曾经在旧书店见过国内学者写的《杜国清论》, 谈及其诗歌——我还是喜欢他翻译的米沃什多一些。帕韦泽的诗集则出自台湾桂冠图书出版的“欧洲经典诗选”丛书, 李魁贤翻译。如果说米沃什的诗歌预先震撼了我(毕竟之前读了一些), 帕韦泽的诗歌则是当场震撼——之前只知道他传说中的小说《月亮与篝火》, 谁知道这位只活了 49 岁的作家还写诗, 而且写成这样。黎佐斯和帕韦泽收在同一本书里, 他早年穷病, 自信仰马克思主义后屡遭政治迫害, 长寿的一生多在艰苦的牢狱中度过。他产量奇多, 出版了 50 多本诗集(还不算译作), 因信仰之故, 他的诗歌都有针对大众的一面, 但这并不能说明其诗歌品质仅仅是政治诗(凌越最近写巴列霍诗选的书评, 称“……聂鲁达中期的《诗歌总集》则犯了意识形态先行的毛病, 总归少了些亲切之感, 远不像巴列霍的政治诗篇那样结实和迷人”——巴列霍换作黎佐斯, 同样适合)。黎佐斯的政治诗丝毫没有说教味, 饱满深远。他写的关于童年的诗, 感情丰富一点的恐怕会感动到哭。黎佐斯在欧洲享有盛誉, 对他的译介甚多, 他长达 20 多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90 年去世), “几乎囊括有意义的所有国际文学奖”(李魁贤语)。

这两本书都是借自凌越, “诺贝尔文学奖全集”, 大陆也有翻版, 我曾在某友的书架上见到, 兀自忍了哈喇子。“欧洲经典诗选”则是正版, 香港和孔夫子都有卖。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读了一年的经济学，有两个小想法趁着年底盘点，说将出来。

第一是我们可能一直在误读经济学。可以肯定，大众的经济学阅读更多的停留在工具理性的层面，市面上充斥着的经济类图书，被人们误以为是一些可以带领人们发家致富的工具书。经济学被人们的阅读习惯降低到如此庸常的层面，相信这绝对不是经济学的初衷，这只是一场误会。不过这样的误会早已有之。奥地利学派著名的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曾经为此专门向他的学生陈述：“经济学家不是商业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在自由社会的角色是纯粹教育性的，只有当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使用暴力的机构干预市场时，经济学家的用武之地才会扩展开来。”

我把罗斯巴德的语录拿来唬人，其实是为了安慰自己。圣诞节这一天，《新京报》的同志们邀请我们就一年的图书说话。我从各大出版社的老板们那里再一次听到了他们的热点所在，才发现我过去半年多以来给读者们推荐的书，都是一些放在书店的杳无人烟里堆积了厚厚一层尘土的无人问津的东西。真正的经济学多么寂寞啊，我提醒自己，我之阅读经济学，最多就是为了在寂寞里自己一个人找乐子，切不可把自己提升到救国救民、启蒙时代的宏大高度。我没有那样的使命，也没有那样的责任。

第二个感受则是这一年来读得更多的，是翻译过来的经济学著作，一直想发现一些伟大的本土经济学著作。可惜的是，本土的原创性经济学著作本来就少，有质量的就更少了。艾青同志说过了：“为什么我的眼睛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南方都市报》的老师在鼓励我们进行年底盘点时也吩咐说，尽量少选翻译过来的书，要为我们自己的文化事业鼓与呼。我觉得这么做很有道理，谁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啊，所谓敝帚自珍，自家的东西再差，也是自家的。何况，那些翻译过来的书，很多好东西不是被自我审查系统给审查掉了，就是被翻译者的蹩脚的外语给篡改了。

正是抱着这两个心态，我开始了我的经济学年度盘点。

首先需要隆重推出的，便是吉林省省长韩长赋的书《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7 月)。现代教育学有句俗话，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我想说的是，好官员可能也需要使劲夸，他会越夸越好。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对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选择性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城乡流动及人口城市沉淀模型，描绘了农民工的人口城市沉淀曲线，指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历史过程和基本思路，得出了农民工问题是战略问题，将伴随我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并将随着现代化基本实现而终结，其终结点将在 2050 年前后出现的基本结论。换句话说，这本书可能是 2007 年中国内地经济学领域最具有方法论价值的一本经济学著作。它将让那些以经济学为职业的诸多国内学者汗颜，并可能在我们的经济学史中，留下比较醒目的一笔。



第二本让我有民族自豪感的书是赵迺迺先生的《欧美经济学史》(东方出版社, 2007 年 5 月)。这本书 1949 年之前就大名鼎鼎，台湾出版了好几次，托改革开放的福，我们今年终于读到了它。这本书在大陆出现，可谓正逢其时，对于那些憋足了劲头要探索新经济制度的领导而言，赵先生的书是个不错的提醒。我们不应该在某些乌有的意识形态之下，用特色之名抵御常识，我们可能只需要认同规律，尊重历史。



第三本本土著作当属吴敬琏先生的《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 9 月)。吴先生乃顾准学术体系最卓越的继承人，我们经常被他的众多极有建设性的声音深深打动。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吴先生的经济学体系宛如一首教育诗，他一个人做着开启民智，也开启官智的工作，如同当年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教育那个时代的德国人一样。有意思的是，前日遇读书人沈昌文老先生，他说吴敬琏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难得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真是不错的评价，在此谢过昌文先生。

第四本则是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6 月)。侯家驹先生是台湾人，以治经济学史见长，台湾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我把家驹先生的书列为让我们自豪的经济学著作。大陆人可能对家驹先生可能陌生，更多的人知道黄家驹，知道侯家驹的人就太少。家驹先生 2007 年 12 月 19 日刚刚去世，我们在这里向先生的灵魂致哀。

先生是安徽无为为人。1947 年随“青年军”去台，后任职“陆军总部”军报社。1954 年以长诗获五四文艺奖，并考入省农学院，复入农经研究所。1966 年获澳洲新英格兰大学硕士学位，1966 年秋返台，执教于中国文化学院。后任东吴大学经济系主任。1973 年，为美国耶鲁大学客座研究员，1974 年筹组东吴大学国贸系，自任系主任。后为东吴大学国贸系教授、“行政院”经建会咨询委员、“经济部”物价督导会报顾问。致力于经济学研究，并涉猎中国经济史，学术造诣颇深，多有成果。著有《生产财价格导论》(获学术著作奖)、《边际分析与平均分析》、《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民生经济思想》、《我国重农轻商思想之研究》、《中国财金制度史论》、《国际贸易的挑战》、《先秦儒法两家管理观念之比较》等，编著《台湾经济发展论文集》等。

跟国内的诸多经济学家相比，侯先生无疑是学术等身，他的《中国经济史》洋洋 70 万言，出版于 1994 年，填补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空白，是一部必须要读的好书。

最后一部我推荐的商业图书是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信出版社，2007 年 1 月)，上卷上半年已经开始红火了，下卷 2008 年元月就能上市。这是一部能赚钱的书，也能呈现晓波兄的一些理想。我知道他正在酝酿“中国公司史”写作，《激荡三十年》应该算是一本关于中国公司史的尝试之作。现在，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公司史”无疑是个学术空白地带，晓波由碎片式的写作试图发展到历史性写作，如果有所成，首先填补的，将是一个学术的空缺。其次，我们的企业、学校，乃至官员，都可以在历史的流变中开始看明白中国企业的命运。所以，作为晓波的同行，我没有理由不为他叫好。



末了，我提醒有独立思考倾向的读者别上《货币战争》(宋鸿兵编著，中信出版社，2007 年 6 月)的当，这也算是本土著作之一，不过这可能是 2007 年最没有财经常识的一本书，因为迎合了某些国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竟然一时间畅销起来。我相信这是某个书商为了发财刻意制造出来的泡沫读物，其中的假想敌思维，夸大其词的煽动，让那些信息面狭窄，思考能力有限的读者迅速升上来一种廉价的激情，犹如当年的《中国可以说不》。几年之后，我们看到中国要发展，走到世界的文明体系中去，多沟通，多交流，多学习，才是康庄大道，那种莫名其妙的对立情绪，仇恨心态，只能让这个千年古国更加积重难返。

子非鱼李多钰说了：文化是一个人的事业，我们没有打算影响别人，能把自己影响到，我们的文化事业就差不多了。大致是这个意思吧，这是句不错的感叹，她在台上说，我在下面听，忽然就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就此谢过子非鱼。

##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从 2006 年 6 月开始，我每周会为《南都周刊》写两篇三百余字的书讯，时间一晃，这种固定式的写作如今已有一年有余，推荐的新书粗略算来，大概也有百十来本了。但是仔细回想，在这些推荐的书中，笔者自己认真读过的或许只占十分之一。这当然首先是因为每个人精力有限，无法穷尽新书；其次则是因为作为读者，虽然一方面要经受住每月新书的诱惑，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留给了很多经典书籍，就如卡尔维诺所言，“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可见读书一途，“新”书本身或许也是一个迷思，读者不可不察。



在 2007 年末盘点这一年来的新书出版，常会感觉自己往往推荐的书既“新”且“旧”，“新”自然是因为它们大多数是初次出版，或许更是初次翻译，而之所以为“旧”，则在于笔者所珍重的许多书籍，尤其是西洋书籍，往往历岁月弥久，自然也可称为“旧书”。

除开书本身而言，阅读其实和一个时代的思想状况紧密相关，时至今日，关于改革三十年，检讨经济、政治转型的讨论会与研究著作比比皆是，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把这三十年来的思想转型史说得通透明白。因此从这区区一年里，通过阅读史来观察思想变迁的某些特征，应该是一个有趣且有价值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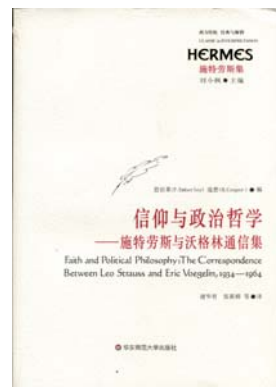
对于自由主义思潮而言，这两年来所引进的书籍力度虽然不减，但是由于像罗尔斯、哈耶克等自由主义巨擘的著作大多已被介绍殆尽，因此关于自由主义思潮的书籍，越来越专业化与琐碎化。比如在民主与宪政理论方面，就有桑斯坦的《就事论事：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泮伟江、周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斯塔萨维奇的《公债与民主国家的诞生》（毕竟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这套“宪政经典”的丛书启动已有几年，包括白哲特的《英国宪制》（李国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样的经典宪政著作。这样的翻译出版取向或许也可揭示，自由主义思潮的引进到今天，由于其内部的思想背景和源头争议并不大，而大部分问题其实需要从具体的经济、政治问题入手考虑，所以法律问题与经济问题往往成为自由主义思考的重点所在，宪政自由主义与市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兴起，相信也有这一思想的缘由。例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派成员的书籍最近被大量出版，米塞斯的《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戴忠玉、刘亚平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等等实际上也是自由主义思潮继续推进的结果。



而相对应的或许就是“新左派”思潮，也有人强调，这一思潮类别或许应该称为“批判性知识分子”。不过对于他们而言，思想资源相对庞杂，并无一定之规，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都可构成其思潮的底色。就如波兰尼的名著《大转型》（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就曾经是汪晖等人批判现代市场的重要思想资源。而像沃勒斯坦这样的大左派，也是国内关注的热点，他的世界体系理论自然为人熟知，也成为许多“新左派”学者的重要理论武器，《美国实力的衰落》（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中所提出的“反体系”运动，相信也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同。

文化左派的资源也是层出不穷，这方面以印度学者尤为引人注目，相关著作的引进也是接连不断，如斯皮瓦克的《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陈永国、赖立里、郭英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查特杰的《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田立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等等，不过这一脉后殖民的思想资源，大多存在于学院之中，难以有广泛的思想传播。与此有相似性的是日本左派思想近年来的进入，比如子安宣邦、柄谷行人、高桥哲哉等人的著作都陆续被译介过来，而读者如果想一窥全豹，不妨一读赵京华的《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三联书店，2007年8月）。值得补充一句的是，左翼与后现代思潮的结盟，如今构成了中国“新左派思潮”的一个典型特色，这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潮存在相当的差异，如何看待这样一个取向，倒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问题。

而对于古典主义思潮而言，在西方思潮方面，当然还得唯列奥·斯特劳斯马首是瞻。2007年尽管没有他的著作翻译出版，但其门徒的著作仍然继续。比如雅法的《分裂之家危机：对林肯-道格拉斯论辩中诸问题的阐释》（韩锐译，赵雪纲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不过于我个人而言，2007年最有价值的书籍应该是与沃格林有关的两本著作，一本是《无约束的现代性》（张新樟、刘景联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该书的英文版实际上收于《沃格林全集》的第五卷，同卷中的《新政治科学》（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实际上更为重要，可惜如今尚未有人翻译，而另外一本则是《信仰与政治哲学——斯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谢华有、张新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这本收有两位20世纪最伟大政治哲学家之间通信的书，直接点明了



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人类之间的精神冲突，难道就是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斗争所孕育出来的？这绝非仅仅是一个哲学专业的问题，恰恰相反，沃格林与斯特劳斯都对当代学院专业分工下的知识体系表示不满，他们都试图恢复一个古典的哲学传统，从最根源处去思考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处境，而这无疑也是你我都面对的重要问题。



这里必须要补充一句的是，共和主义思想传统近年来也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追捧，从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3月）开始到当代一些共和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共和的黄昏：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应奇、刘训练编，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8月），都陆续有相当多的思想引介。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其思想起因应该是对自由主义重权利、轻德行的逻辑有关，所以看重公民德行的共和主义自然也成为一些知识分子理解中国政治的便当资源，至于是否恰当，恐怕还需



要思想与现实的来回磨合试验，方能观察其效了。

通过对 2007 年的新书出版来观察今天中国的某些思想特征，难免会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但是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的思潮竞争最为微妙之时，今天的阅读史实际上也可看作是一部完整的当代思想史。

##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xy1978@hotmail.com)

岁末，又是“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一切都在上涨，只有人文图书的出版呈现减缓趋势。一为出版社主动为之，12 月份的新书过了一个月就成了隔年的茶，在宣传上具有劣势，再加上 1 月份有北京图书订货会，所以不少图书推迟出版。一为出版社被动为之，现在不少印刷厂等米下锅，纸张已经成为稀缺资源。读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的时候，记得最清楚的一个细节是，当时很多“纸老虎”囤纸发财，远远胜过囤积钢铁者，因为日本人认为钢铁是军用品，用极低价收购，纸张没有这种后顾之忧。陈存仁先生专门提到一位发明“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的著名女作家，与陈公博有染并且获得他配给的很多白报纸，女作家坐在满载白报纸的卡车上招摇过市，一时传为笑谈。书中没有透露这位女作家的姓名，可是对当年掌故有所了解者很容易索隐出此为苏青，她把《礼记》中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重新标点了一下，改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传诵一时。苏青乘着卡车兜风的细节，难以考证，如果属实，52 岁农民周正龙应该向苏青学习，与其辛辛苦苦拍摄华南虎被“居心叵测”的网民戏称为“纸老虎”，不如囤纸发财，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纸老虎”。



虽然纸张稀缺，并且价格扶摇直上，很多书的定价之高还是超出想象。正如肉价上涨 10%，很多餐饮店至少要上涨 30% 才肯罢休。见到费大为主编的两卷《'85 新潮档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1 月），总共大概 1000 多页，拿起看看定价是 138 元，赶忙放下。谁知旁边的书店老板告知，两本书是单独定价，138 元仅是上卷，下卷还需要 118 元。看到老板对这套书的销售心怀疑虑，我赶忙安慰说，搞艺术的人不会在乎这点碎银子，销量不成问题。谁知老板一听大为失望，因为这两本书有塑封，他没有打开看过，以为是民国的《新潮》杂志，研究机构肯定会吃进。此前，我一直为“书价过高说”作辩护，并且经常举例当年《辞海》缩印本要 27 元，一个月的工资不过买两本，现在是 230 元，差不多可以买十本。见到这套《'85 新潮档案》，我准备放弃这种不合时宜的辩护了，因为它的定价已经接近香港标准，但是香港工薪阶层的收入数倍于我们，香港学术界的收入更是数十倍于我们。

我对 2008 年书市的第一个预测是书价肯定会进一步上涨，而且是“一片大涨，不是小涨”。同志们不要着急，我对 2008 年书市的第二个预测是打折周期肯定会进一步缩短，就在撰写此文的这一天，我刚刚购买了三折的蓝英年《回眸莫斯科》（文汇出版社，2004 年），版权页上赫然印着 200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印刷仅仅 3 个月后就三折，这破了我购买打折书的历史纪录。2008 年书市的两个发展方向，是一对非常怪异的组合，说明了图书市场继续向着不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展望未来之后，接下来要回顾过去了。在每个月的“中国独立阅读报告”里，在给《先锋中国评论》、《中华读书报》撰写的年度图书印象记里，我已经做了很多次喜鹊，盛赞过很多种图书。这次就当是新年的化妆舞会，我要做一只乌鸦，列出严重不推荐的图书、作者、译者。感谢《潇湘晨报》让我提名“年度烂书榜”，唤起了我的乌鸦嘴，虽然我对“烂书”这个称呼并不是非常赞同。

2007 年度严重不推荐的首席图书是宋鸿兵编著的《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 年 6 月）。我一向歧视“编著”或者“编译”的图书，网上更是有人怀疑此书涉嫌抄袭，为之辩护者称“真相不因为作者抄袭了而变成假象”，我在这里不讨论抄袭还是原创的问题，理由是“假象不因为



作者抄袭了而变成真相”。这本书让我想起了大约十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大约五年前的《狼图腾》以及销量惊人的《环球时报》，虽然它们关涉的领域不尽相同，却遵循着相似的思维，就是寻找假想敌。与其说《货币战争》揭示了“阴谋论”，不如说它本身就是“阴谋论”的产物。当知识青年为《货币战争》叫好的时候，编著者和出版者正在忙着数钱，他们才不关心全球经济被哪个家族控制呢，读者的钱到了自己手里，这才是硬道理。严重不推荐的次席图书是王朔的《我的千岁寒》（作家出版社，2007年3月）。我喜欢王朔的绝大部分文字，但是这本除外。这是一本书，还是行为艺术？王朔推出自己的一堆“天书”，然后放出风声，称这本书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没想到这个激将法基本失效，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兴趣，他又失去了很多中低级知识分子，后者可是他的“票仓”。



2007年度严重不推荐的首席作者是于丹。“百家讲坛”推出不少学术明星，我并不反感，而且非常能够认同学术公共化的取向。但是我在于丹的书里看不到学术、思想或者文化，不管《论语》还是《庄子》，在她那里都成了“真”、“善”、“忍”三个字。于大师的“三字经”，让人觉得似曾相识。刚刚看到报纸，12月12日，于大师在据称是江南最大孔庙的浏阳文庙讲座时，浏阳市全体科级领导干部、中学教师3500人没有上班，集体聆听了“带功报告”。严重不推荐的次席作者，有很多人选，我权衡了一下，还是郭敬明最为合适。按照王朔的说法，只知道“一个小偷叫郭敬明”，2007年，这个小偷出了一本叫做《悲伤逆流成河》（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的“力作”，还加入了一个国家级协会，不过这个协会不叫“小偷公司”。

2007年严重不推荐的首席译者，我在龙婧和李斯这对“金童玉女”之间难以取舍。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里，我已经分别授予他们“史上最牛译者”和“史上最最牛译者”的荣誉称号，一位4年至少翻译23本书，另一位译著远销台湾，两位同时还都有“小偷”之嫌，难分伯仲。虽然此后已有包括台湾在内的几十家媒体报道了这对译者的光辉事迹，在《世界时装之苑-ELLE》2008年1月号上，我依然看到杂志在推荐龙婧翻译的《穿条纹衣服男孩》（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最后，我对2008年书市做出第三个预测，以上严重不推荐的图书、作者和译者，绝大部分将在2008年继续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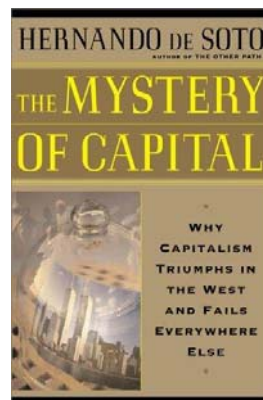
## 书评·政治与社会

### “资本的秘密”还是“资本的难题”？

书评人 张昕（美国·洛杉矶 [xinzhang999@gmail.com](mailto:xinzhang999@gmail.com)）

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这本书在英语世界已经畅销多时。据说在国内也颇为热卖，已经出了两个不同的中译本。这本在学术圈内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的书如此走红倒是有些意外。

概括说来，德索托在书中以“资本的五个秘密”的提法表达了那么几层意思。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并不穷，那里的居民其实拥有巨额财富（主要是土地和房产）。但是由于那些“非法占地者”（squatters）对资产的实际控制权没有得到法律和国家的认可，这些处于“法律外”状态的财富就成了德索托所说的“僵化的资本”（dead capital），无法发挥资本本来可以发挥的神奇功能；而“无恒产”状态也使得发展中国家中相当一部分居民被隔离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性之外。现在的西方其实也经历过类似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他们建立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就是政治精英认识到不可能长期把大多数人隔离在正式的产权体系之外，因此不断调整法律制度，把大多数居民处于“法律外”状态的资产逐步纳入正规的法律体系。在总结美国土



地立法的基础上，德索托提出现今发展中国家的立法者应该潜心学习社会中已经形成的关于产权的“社会契约”，通过把这样的处于法律体系之外的契约合法化来启动所谓的产权革命。

这本书获得如此多的关注和好评的原因可能在于，它给政治观点迥异的各个派别都提供了有吸引力、能够认同的信息。对左派而言，该书的政策建议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因为德索托的所谓产权革命是帮助现存体制下经济上的边缘群体获得正式的财产权利。对右派而言，德索托不仅用一套新的语言重复了资本主义可以造福所有人这样的命题，并且坚持建立资本主义的产权体系可以通过暴力手段，需要的不过是当局者政治意识上的觉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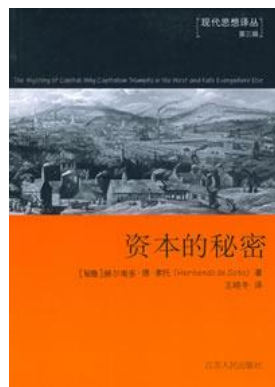
德索托畅销书式的行文使得书中许多重要结论的得出都显得颇为轻率。他开门见山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居民所拥有的“僵化的资本”总值至少是 9.3 兆美元这样的天文数字就很值得深究。书中并没有说明这个现在被众多德索托支持者所广泛引用的数据如何得出：哪里来的关于非正式土地占有的数据？土地的平均价格如何得来？何以可以适用于整个发展中世界？（英文版，Table 2.1）而德索托命题中的经济逻辑链“产权合法化—投资—经济成长”也高估了对非正式产权给予合法化的作用：在多个国家已经进行过的试点当中，产权合法化并没有产生如作者所鼓吹那样的神奇效果。换句话说，由“恒产”带来的“恒心”固然重要，但是“恒心”和“投资”、“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见得是德索托预见的那样简单。虽然对一本非学术类著作不能以学术专著的要求去衡量，但身为职业经济学家的德索托对于学界已有的许多研究成果似乎是有些太怠慢了。

德索托命题背后最具有迷惑性的是他的政治逻辑。他是拿西方（其实就是美国）的土地史来给现在的发展中和后共产主义国家上课：承认“非法占地者”的权利，于己于人都有利。但是，德索托一直含糊其辞的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例里，那些“非法占地者”占的究竟是谁的地？而所谓的“非法”又是违反的哪一家的法？合法化这些人的产权会得到现在土地所有者的支持吗？

正是对产权合法化的“冲突”本质有意无意的回避使得德索托笔下的“美国往事”几乎成了一个政治精英单方面“良心发现”的过程：掌权的精英阶层意识到资本主义不可能把大多数人排除在正式的产权体系之外，所以不断调整法律，将非法占地者这个阶层不断吸纳进正式法律认可的财产体系里。如德索托自己总结，无论在哪里，“这个财产革命总是一个政治胜利。在每个国家，这样的胜利源于几个政治上的开明人士认定：如果相当部分的人口生活在正式法律之外，这样的法律将毫无意义。”（英文版，160 页）然而，即便只是根据德索托自己提供的历史证据，读者也应该不难读出另一个故事：美国土地法的改变更多是草根阶层奋起抗争、依靠政治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逼迫精英修改围绕财产的游戏规则。州与州之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大土地投机集团和“散户”之间、国会和最高法院之间，所有这些层面的冲突不仅展开在国会议事厅内、各级选举的投票站内，更有在不同占地者之间的械斗现场、占地者和州民兵、联邦军队之间武装对峙的现场——更不要忘了那些在德索托笔下难得出现的北美印第安人了——所有这些都并非德索托所暗示的那样和风细雨的关系。

作者关于产权合法化的政策建议假定关于产权的“社会契约”已经存在，因此开明人士只要有耐心和勇气将这样的“社会契约”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正规化即可启动产权革命。可看看北美印第安人在土地问题上不断翻旧帐的努力，看看这几年穆加贝在津巴布韦强行推行针对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再分配，这样的“社会契约”是否存在是要打上个大问号的。

再回到德索托推崇备至的美国经验上，即便政治精英有主动让度地权的姿态，当时的考虑也更多的是利用拓荒者更有效率地保护尚显脆弱的西部领土，那种真心诚意要把所有人都纳入财产体系的动机恐怕最多只占据次要地位。



德索托把所有的发展问题都归结到产权问题，又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产权问题归结为单一性质的“非法占地”问题，这是又一处要让他政治逻辑大打折扣的地方。在他的美国故事里，历史上“非法占地者”（还不包括印第安人）是多数，承认这些原先被边缘化的人群的财产诉求，是在承认他们的政治权利的同时给予相应的经济权利。而在我们更加熟悉的“后共产主义”语境里，产权改革的主要难题之一是原先的国有企业的内部人占了属于全民的资产。这里的“占地者”是少数人，而事后将他们的财产权合法化，在政治上面临的挑战和德索托故事里的逻辑是完全相反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故事就是最有力的例证。

如果把德索托的产权合法化命题进一步地一般化，更多的难题会接踵而来。承认非法占地者的产权是不是必然以侵犯其他人的产权为代价？这和“私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逻辑如何协调？坚持承认既定事实的原则会不会导致产权分配上“先下手为强”、“强权就是公理”（Might makes right）？相应的，德索托是否实际上是在支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论”，尽管他在书中对这个论调有所批评？如果德索托认定法律始终应该跟从民意，立法又如何避免暴民意志（mob rule）、如何协调民主和法制之间的关

系？就象他回避产权分配的冲突本质一样，德索托也回避了这些棘手的问题——有意或是无意的。

《资本的秘密》对于中国读者无疑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农村土地改革、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包括最近因小产权房引发的争议），一切跟产权有关的现实难题看起来都可以纳入德索托命题中去审视。只不过，与其说德索托给了我们什么现成的答案，不如说对《资本的秘密》批判性的阅读会迫使我们去思考一连串在产权革命面前我们无可回避的难题——资本的难题。

**Hernando De Soto: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Basic Books, New York. 2000.**

[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王晓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于海生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1月。

## “下流”，怎么了？

书评人 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两年前，日本作家、社会学者三浦展的《下流社会——新阶层集团的出现》出版，一时纸贵东洋，4个月加印12次，成为近10年来屈指可数的百万级畅销书。2007年9月，作者又推出了续篇《下流社会 第2章——须眉何以输巾帼》，亦引发话题效应，颇有后来居上之势。两者相辅相成，谈的是同一个话题：日本社会的“下流”化及其出路。

先做名词解释。所谓“下流”，原意指河川的下游，被作者转意为下端、底层，并没有汉语中形容人品行不端、举止轻佻狎亵的意思；而“下流社会”，则为作者的造语，相对于此前传统的“中流社会”而言，指社会向下发展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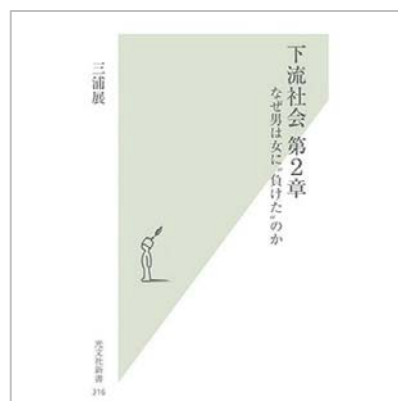
开宗明义，作者先对读者做一番“下流度”测验：在给定的12个要素中，如有半数以上命中，便说明被测验者是“下流”的。这些问题包括：年收不到年龄的10倍（单位应为“万日元”），想活得像自己，喜欢独处，常以点心和快餐充饥，有时整日在家打电玩、上网，大龄未婚（男性33岁以上，女性30岁以上），等等；在续篇中，又追加了在2005年9月众院中初挺自民党，有时会被石原慎太郎吸引，在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上衷心声援日本，讨厌中国和韩国，觉得在工作上即使努力也无法得到回报，等等。通过对上述在数以万计的问卷调查基础上“提纯”的要素的选择倾向的观察与分析，社会中特定人群、年龄层的价值观，生活、消费观的变化曲线凸显出来，据此，作者得出了日本社会已日益“下流”化的结论。

“下流”者，未必单纯指收入的低下，也包括沟通能力、工作态度、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方面的不振，就是说，对人生的意愿本身，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表现在结果上，就是收入水准上不去，老大不当婚的几率甚高。他们慢吞吞地走路，慢吞吞地活着，因为只有如此节奏，他们才觉得爽。这类人不仅为数甚众，且在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即“团块次世代”——战后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当中，有日益蔓延的倾向。

而这代人，正是日本社会在成为“一亿总中流”的中产社会后诞生的一代，其特征是，他们从未见识过显著的贫富差别。在郊外卫星城的新兴住宅社区里长大，同龄的人拿同样的年薪，住同样大小的公寓，开同一档次的车，在他们是天经地义。他们既缺乏从“下”往“中”，或从“中”往“中上”上升的冲动，也不太会考虑有一天会从“中”掉到“下”的可能性。

受惠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和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政策，正如其父辈经历过的匮乏的平等一样，这代人在富裕的平等中长大成人。周末开车去郊外的 Shopping Mall 采购，琳琅满目的商品以低廉得奇的价格批量出售，应有尽有。在这样的时代，还成天琢磨努力工作赚钱的人确实显得有点傻。就像登富士山一样，对山顶有更美的风景的期待是唯一的动力。但差不多登到“七合目”的时候，风景已足够雄奇，再往上攀也不过尔尔，巅峰体验的刺激便难以维系登顶的诉求。于是，哥几个就地坐下，喝点冷饮，吃个火山熔岩煮鸡蛋，指点一番江山，下山了事。

曾几何时，日本以“一亿总中流”为骄傲，整个国家宛如一间巨型公司，手提公事包、身穿蓝色西服套装的 Business man 绕世界飞，被西方人奚落为“日本株式会社”。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经济泡沫大而未破的时期，日本人始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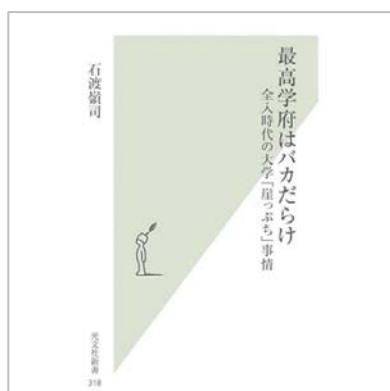


以为增长神话会无限持续下去，东洋式管理模式也会被世界普遍移植、嫁接（西方也不乏类似的声音，诸如美学者傅高义的《日本世界第一》（《Japan as No.1》）等）。但泡沫还是破了。这一破，让日本十年不振。不仅不振，世风随 GDP 而江河日下，人心道德受到空前严厉的试练。

再度从泡沫经济废墟中崛起的日本，对公司管理的东洋模式已不复从前的自信。目睹泡沫崩溃后，被认为永不会倒的百年老店的银行、证券、金融机构一间间倒闭，日本人终于知道没有什么“永远”的，包括东洋式的终身雇佣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年功序列。今天，包括日本顶尖的数家电机制造公司在内，公然打出“终身雇佣”招牌的企业已然绝迹。但与此同时，随着企业的瘦身、重组，大量冗员被清除出“蓝西装”的行列。这些昨天的上班族，因种种原因，成了从日本工业生产线上脱落下来的螺钉。他们与成群的“飞特族”（日人根据英词“Free”的造语“Freeters”，近乎中文“自由职业者”的表达）、“尼特族”（日人造语“NEET”，意为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失业者、无业者一起，成了日本“后泡沫”社会的游魂。

毋庸讳言，“下流社会”现象的始作俑者是小泉（纯一郎）—竹中（平藏）经济路线，是前者开创的“构造改革”的“负的遗产”。其理论来源是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张“国富”由少数精英创造，而大众只需消费“国富”，唱唱歌、跳跳舞，扩大内需即可，基本上是以拉开“格差”为前提的理论预设。当然，从彼时企业不良债券呈恶性膨胀的天文数字的现状出发，作为“被动改革”之一环，如此政策设定大约是别无选择。但即使在后来的安倍政权时代，关于“格差”问题，来自政府方面的权威解释依然是让穷人能活下去，但富人可以赚更多的钱，越富越好。可见贫富差距并没有被“恶”视化，至多是一种“有限恶”。所以，“格差”问题作为新的社会问题历史虽不长，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问题将长期化；放置下去的话，日本社会的两极分化还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

在战后生根发芽的日式民主主义社会，基本只有“阶层”的观念，而“阶级”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但随着“格差”矛盾的深刻化，原本呈梭形结构的社会分层迅速分化，并有朝金字塔型社会重构的危险。类似英国社会中劳工阶级与管理阶层之间边界井然的鸿沟，将来未必不会出现日本版，在“飞特族”、“尼特族”与大公司白领之间形成“us and them”式的紧张。



所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日本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重组，虽然有严重的问题，但基本上还是社会性的，尚无升级为政治性矛盾的迹象。出现一定的社会分层，甚至社会分层加剧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阶层及不同阶层之间“格差”的固定化。因为后者意味着父母“下流”，孩子便一定“下流”，而这是与民主主义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及其道义诉求相悖的。对此，作者开出的药方是“机会恶均等”，即在教育等领域，旨在促成机会均等的现实，但却力避那种“绝对机会均等”论主宰的“过酷”的社会竞争（譬如，说你成绩不好，不是因为父母的低收入、低学历，完全是你自身的低智商所致。如此“自然淘汰”的结果，必然指向人的遗传基因，有导致某种“恶的优生”思想的危险）。

日本之所以在改革后会形成“格差”社会，很大程度上当归咎于长期以来“结果恶平等”的分配机制，即无论个人能力大小，努力与否，反映在工资待遇上，几乎差别全无。到头来，除了造成“结果逆差别”、“结果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损害实质正义外，客观上成了催生今天这种基于实力主义、成果主义的“格差”社会，并使其定型化的“催化剂”与口实。

但是，在检讨社会的“下流”化及其出路的时候，还应当认识并撇清一种事实：相当一部分“下流”分子的“下流”化现状，并非社会淘汰的结果，而恰恰是基于其自甘“下流”的自我选择的结果，因为他们“想活得更像自己”。尤其一些女性“下流”分子们更是如此——“下流”并快乐着。2007 年度芥川文学奖获得者青山七惠（Nanae Aoyama），便是一名 1983 年出生的女“飞特族”，其获奖小说《一个人的好天气》（《ひとり日和》）被认为是一代“飞特族”的青春告白。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以三十来岁的青年为主流的“下流”分子们所选择的“下流”活法，在清一色“蓝西装”的“日本株式会社”，未尝不是一种社会进步，初次呈现了人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机器，社会作为人的社会而不是生产线的一种可能性。当这些多数还处于过渡期的分子们真正以自己的活法，活出了自己的时候，也许便是社会产生更多元文化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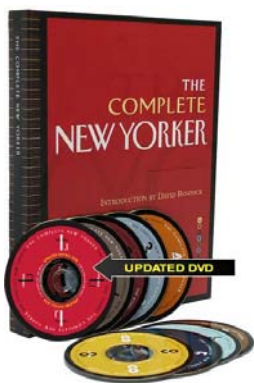
所以，真正有骨头的“下流”分子，是那些自甘“下流”者。面对来自体制的压力与白眼，他（她）们有勇气理直气壮地说：下流，是的。So what?

三浦展：《下流社会——新阶层集团的出现》（『下流社会——新たな階層集團の出現』），[日]光文社，2005 年 9 月第 1 版，2006 年 1 月第 12 次印刷；《下流社会 第 2 章——须眉何以输巾帼》（『下流社会——なぜ男は女に負けたのか』），[日]光文社，2007 年 9 月第 1 版。

## 书评·文学

### 纽约客八十年

书评人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huiyuanma@gmail.com）



创刊于 1925 年的《纽约客》，本意是当幽默通俗杂志来做。它的最初几期充斥着玩笑和八卦，接下来，风格几次大变动，销量骤然升高又猛降。后来由于时局的影响和主编的刻意努力，逐渐成为严肃的文学原创和批评杂志，幽默和漫画还在，不过只是调剂而已。它的风格稳定下来，连它的漫画和插图也自成一家。P·罗斯、E·B·怀特、塞林格、纳博科夫、桑塔格等等名人都为它写过文章，其中 E·B·怀特的专栏和随笔，坚持了五十多年（1925-76）。他的妻子安格尔，正是《纽约客》当时的文学编辑——这场“二难相遇”的双重婚姻，已是著名佳话。另一名作家约翰·契弗自 1935 年始，在刊物中发表了一百多篇小说。这样稳定的机会和不舍的磨练，恐怕让世上的同行艳羡不已吧。

2005 年，杂志满八十岁之后，出了一部精美的合订本，其中一卷精选集，**Highlights from The Complete New Yorker** 收集了八十年中几乎逐期杂志中有影响的文章，每篇取一页，带着原始的广告、插图和版式。逐页读去，我有时恍然经历历史，目击这个国家当年的虎虎生气和喧嚣，有时又觉得情景亲切，一幕幕普通人的生活，跟眼前并无不同。“文学”的旧和新，往往就在于此。而一本“文学杂志”虽然在自己的择稿标准下，只收录了时代的吉光片羽，虽然和任何声音一样，为世界增加着幻觉和偏见，但到底是一种忠诚的伴随吧，并且自有矜持之态。如今网上关于这本杂志的博客很多，有一个愤世嫉俗、认真而风趣的博客名为“我恨《纽约客》”（<http://www.ihatethenyer.blogspot.com/>），作者据说是个“仇恨”它的铁杆订户，常常对之逐页扛杠批评，偶有赞赏——也许“文学杂志”看久了，人会变成这个样子：几分苛刻、几分修养、几分自以为是，也有认真和敬畏。这样骄傲的文学读者其实是不嫌多的。《纽约时报》曾经载文批评《纽约客》的诗歌版总是刊登某些诗人的作品，择稿不公，有徇私之嫌。当时的诗歌版编辑奎恩（Alice Quinn）女士反驳说，发表的诗歌有 85% 来自不知名作者。今年，《纽约客》宣布奎恩离开，由出生于爱尔兰的木尔登（Paul Muldoon）来接管这个版面——据说这是美国诗坛最有话语权的声之一。

以笔者个人经验，美国的文化产品多数相当便宜，尤其是这类相对高端但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并非专门学术的出版物。拿《纽约客》来说，创刊时 15 美分一期，后来逐年涨价，现在全年定价算来是一美元一期，也实在不贵。此外，在美国任何大学图书馆和多数公立图书馆，基本都能看到全部《纽约客》，占满一两个大书架。

而这本精美的合订本（包括一卷精选集和八张 DVD 光盘），优惠价只卖三十美元，令人感叹好东西易得，难的偏偏是享用它的时间，所谓买书易，读书难耳。读者插入第一张盘安装，以后再阅读和搜索，它会作品根据发表年限提示你插第几张盘，即可读到光盘上的全文。阅读时可调整字体和阅读模式，翻页自由，比纸版读来更舒服。它还保存了全部插图和广告，一个完整的“现场”。因版权故，全部内容可打印但不可复制。

当然，杂志并非字字珠玑，哪怕是名家作品。过于奢侈方便的海量信息，简直让人失去阅读的勇气。不过，对自己偏爱的作者，可以随时查找，的确十分方便。比如那个有趣的 E·B·怀特，就是供搜索的好材料，因为他的写作时间跨度太大。读者如按时间搜索、展开，可浏览一个作家的成长史、内心声音的“上下文”。他笔下文质彬彬的冬天、湖畔、梭罗，后来都成了独立于杂志的出版物。当然，不是所有作者都有这样的幸运。有人在杂志偶露身手后销声匿迹，而那昙花一现中的灵气，说不定有独具慧眼的人来追随，甚至发掘出来光大名声。而这样的私爱，也许只能在杂志合订本中温习吧。

**The Complete New Yorker DVD Collection, 2005, by New York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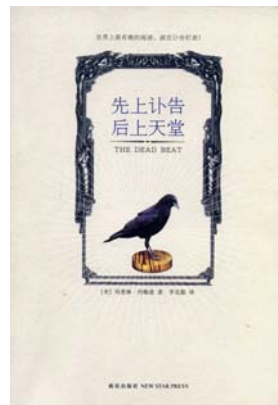
## 书评·文化

# 又走了一个，唯一的一个

书评人 费长房（广州）

华人作家张北海是纽约的长期住户，自他每天看《纽约时报》以来，“每天必看它当天的讣闻”，不仅如此，“纽约有一大堆每天必看讣闻的人”。张北海文章写于1989年——“八十年代，大地开始震动。美国和英国涌现出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人物，相当于本行业的猫王和披头士。他们拿起笔来，开始创作现代派讣告”，纽约的另一个“迷徒”玛丽琳·约翰逊在其《先上讣告 后上天堂》一书里如此交代讣告这种文体在现代美国的兴起。玛丽琳·约翰逊小姐曾经是《君子》等杂志的编辑，她是一名超级迷徒，先迷别人写的讣告，最后亲自上阵，她的得意手笔是曾为戴安娜王妃、凯瑟琳·赫本以及马龙·白兰度等人物撰写讣告。

《先上讣告 后上天堂》一书写的是如玛丽琳·约翰逊一样的迷徒为如戴安娜王妃一样的杰出人物、并不杰出的人撰写讣告的故事：迷徒的世界是怎样的，如何为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撰写讣告，以及为讣告提供阵地的英美报刊各自的风格。对于讣告在西方泛文化领域的运用、特色和作用，本书来了个大起底。



### “我的人物死了没？”

#### ——迷徒与丧主

鲍勃·伍德沃德，揭露水门事件的记者之一，以一篇新闻报道和一本书的“讣告”形式等着“深喉”去世就公布。大家都知道，马克·费尔特先生打破了伍德沃德的如意算盘，他自己提前爆料了。

其实在西方热读讣告的风气下，预先为著名人物撰写讣告的方式可谓司空见惯，不仅讣告作者要做足功课，媒体也要留一手，以防日后天崩地陷那一天被动。书一开篇，本书作者现身说法，从展现一名迷徒分子的迷劲到全景式地介绍当今西方国家里由报纸媒体培养起来的讣告作者（自然，他们都是迷徒）。作为讣告作者，她“密切”关心那些年事已高的著名人物如曼德拉和罗莎·帕克斯（1955年拒绝将座位让给白人的那位黑人妇女），虽然有着给戴安娜王妃等人写讣告的好机会，但她也深为自己所“放过”的人物如毕加索、迈尔斯·戴维斯等人感到遗憾。被密切关注的人也未必就感到不幸。“玉婆”伊丽莎白·泰勒让玛丽琳·约翰逊“怀疑这人永远也死不了”；已故钢琴大师霍洛维兹不仅爱看讣告版，而且“当天见不到自己的名字他这一天就很快乐”！

无论是玛丽琳·约翰逊的关注还是她的遗憾，对于中国人来讲近于不可思议。张北海把读《纽约时报》讣闻版称为“一个可以告人、但从未告人之密”，大体上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死观。不语怪力乱神，生死之事也不可戏谑，讣告更是极尽哀荣的体现。从另一个方面看，玛丽琳·约翰逊们热衷于如此犯忌讳触霉头的事，固然跟八十年代以来关心上层社会名流私生活的娱乐传统有关，但丧主的“成分”并不仅仅流于著名人物，更多的平凡人等也有机会呈现自己的“如此人生”；此外，媒体的价值取向也会影响到讣告这种报纸文体，这些都说明了普通读者在讣告版面上那么短小的一栏两栏里读到的是别人的一生（浓缩的，真实的，而不仅仅是自己认识的亲友那点事）。这浓缩的人生故事对于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像玛丽琳·约翰逊说的——

那么，我究竟是生活在谁的时代？这个人的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他是一帆风顺还是注定不幸？他的岁数比我大些还是小些？他制度如何生活吗？我使劲摇晃着报纸：告诉我什么才叫幸福的生活，把它的秘密告诉我！

也许这就是有那么多迷徒的原因。他们甚至还有业务大会，本书第二章的题目叫“讣告作者的守灵大会”，讲的是作者参加第六届杰出讣告作者国际大会，结识了很多讣告作者。他们有的为报纸撰写讣告，是报纸的固定作者，有的本身就是报纸讣告版主编（如出尽风头的《每日电讯报》讣告版主编安德鲁·麦凯），也有的人因为热爱这个行当，在网络时代，自己建立论坛，转贴，欣赏（如罗斯小姐及她的讣告新闻组），还有的作者“给只有一处红绿灯的小镇上的报纸”写讣告。这群人聚集在一起“业务交流”，包括如何调查丧主资料，各自的讣告写作和媒体讣告特色。

玛丽琳·约翰逊描写了这群讣告作者的姿态，既有当成事业的，也有当成工作的，大会结尾颇具喜剧效果：美国前总统里根死讯传来，各路人马乱成一锅粥，深悔自己不在报社的讣告作者讣告编辑不在少数。对此，玛丽琳·约翰逊说，“请原谅我们的喜悦，但我们毕竟是干这个的。”

### “死在这个时代是最棒的”

#### ——如何写讣告

英国和美国的讣告热潮，都兴起于八十年代（甚至准确到了 1986 年），无论是英国式夹杂嘲讽的小品文特征，还是美国式的热衷调查采访，玛丽琳·约翰逊作为资深讣迷、讣告作者，都能把其中的差异讲得清清楚楚。讣告首先是一种格式，她发明了一套“讣告词汇表”，以英美报刊见报的讣告来讲解：

“丧主定义句”，讣告作者给丧主定位的那个句子，也就是盖棺定论的那句话，在英式讣告和美式讣告中的位置是不一样的；跟在这句墓志铭后的，是亡故情况报告，英国人往往精简死因，而美国人则对“医学细节热衷”。这部分被称之为讣告的“歌舞段落”，美国式的讣告往往发展为带有短篇小说味道故事；接下来再用一两句概括丧主生平，是为“倒档”，讣告作者用它来调整全文的节奏；之后是按年表叙述死者的一生，或者叫“要命的年表”，这是最考讣告作者手艺的地方，有的媒体干脆用方框罗列，干脆叫“黑框框”！除此之外，还有通常位于年表与结尾之间的“引用语”，以及干脆利落又意味深长的结尾——“电讯报段落”，再加上一个常规动作“死者亲属名录”，就是一份讣告的写作格式。

在这些琐碎的“要素”之间，或许可以印证出讣告这种依附于媒体的新闻特征，正是这种新闻体成就了讣告的可读性和客观性。在本书作者提到的有趣又有故事的讣告作者之中，不得不提尼科尔森。不仅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份特征能说明美国讣告作者队伍的“成色”，还能说明讣告同时还是一种文体，一种文学形式。

吉姆·尼科尔森 80 年代起给《费城每日新闻报》写讣告，同时他还有自己的活要干——“在尼加拉瓜搞监听，准备入侵巴拿马，跟毒品贩子作战……”，他从事反恐工作，除此之外还干过很多工作，但在《费城每日新闻报》干了 19 个年头，为超过两万名费城老百姓写过讣告，“篇篇言之有物”。从讣告作者一直做到讣告版主编，尼科尔森以自己的文风，奠定了《费城每日新闻报》讣告版的风格。玛丽琳·约翰逊用了整整一章来谈他，采访过他好几次，而尼科尔森最拿手的也恰恰是新闻记者的功底——调查和采访。尼科尔森观察丧主的世界，把他现实生活的某些片断吸纳到上述的那个枯燥的讣告格式中去。这种做法和尼科尔森做过社会新闻记者有关，也跟美国自六十年代以来盛行的“新新闻写作”的影响有关。尼科尔森是个细节派，在专门描写他的“普通人”一章，间接直接地穿插了很多他的作品。他留意丧主的绰号，这是他的心得，他把打捞丧主的特点用军情部门的术语称之为找出“指纹”、“签名”；他并且极其恰当而准确地使用“引用语”（记者的功底，他有一套自己的采访心得），他描述的人物简洁传神。这些都使得尼科尔森的讣告完全可以当成一篇篇美国短篇小说来读，用本书作者玛丽琳·约翰逊的话说，尼科尔森写的不仅仅是主人翁一个人，还包括所有跟主人翁同样的人。

玛丽琳·约翰逊总结了喜欢讣告的原因，说得极好，“美国的讣告是个混血儿，介于短篇小说和普通讣告之间”，“讣告这个融合了文学、黑色幽默和痛苦的东西彻底抓住了我”。比如尼科尔森写过的一篇：

对朋友们，他有一句亲亲热热的口头禅：“闭嘴，笨蛋。”嫁给大约翰没多久，雪莉·埃利斯便发现丈夫不是个普通人。“我们简直什么地方都没法儿去。在纽约，他时不时地就会大叫一声：‘闭嘴，笨蛋。’街对面马上有人嚷嚷回来：‘你好哇，大约翰。’华盛顿、怀尔伍德、大西洋城，无论到什么地方，总是这样。”

这像某个短篇的故事。给《落基山新闻报》写讣告的吉姆·希勒为伊拉克阵亡士兵写的讣告则是标准的美国短篇小说的情节（本书 P161—162）。不过，英国小品文式的讣告同样有趣得紧，比如他们为卡特总统的兄弟比利·卡特写的讣告：

比利·卡特日前去世，终年五十一岁。这位身材矮胖的先生是吉米·卡特总统的兄弟，酗酒成性，喝醉之后便坐在胜产花生的乔治亚州普林斯自家廊下的椅子上大发议论，每每让白宫尴尬不已。

英国随笔的趣味与讥诮原形毕露。整本书里，我盼望读到《纽约时报》的讣告选集《最后的世界：〈纽约时报〉讣告及告别辞选——对所有这些不同寻常的人生的赞美》，以及 911 事件中《纽约时报》的讣告式采访《悲伤速写》，当然也不能没有一些讣告作者——比如斯蒂芬·米勒编辑的《再会！——当代讣告杂志》和吉姆·尼科尔森所写的讣告。在这本书里摘录的讣告中，我则喜欢下面这篇，这则讣告的丧主是一位培育出三百六十七种土豆的农民，由一位“杰出的烹饪作者”执笔：

有人打电话来订货的时候，（唐纳德·麦克林）都要和对方谈一谈，看他们配不配买他的土豆。他仿佛是要把孩子托付给他们一样，必须先作人品测试。他觉得，如果人们能从一个小小的土豆中知道什么叫品质，就能推而广之，认清世间万物



的品质：电视节目、书籍、政治、社会潮流。这正是他不厌其烦地处理无数小额订单背后的目的，用土豆拯救人类。

### 让“杰出的无名之辈”说些什么？

作为资深影迷，玛里琳·约翰逊这位美国人游历伦敦的节目是在旅馆里拜读和品评伦敦四大报纸的讣闻版，《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它们是讣告的重镇，把自己的讣闻版做成了艺术版，无论从版面的持续性还是报道人物的多样性，都让美国影迷玛里琳·约翰逊自愧不如。她还分别走访了这四家报纸的讣告版主编或编辑，借此将各自的操作手法和处事风格都对读者和盘托出。

但无论是“不为丧主而收回拳头”（亦即不溢美）的讣告风格，还是在讣告里体现时代特色，无论是版面的持续报道还是媒体的力求变化，总的来说，玛里琳·约翰逊所看到的英国讣告，其实处于“社论性讣告”的地位，是属于媒体认为有价值报道的新闻之一。除了这种必须报道的讣告之外，除了花钱刊载的去世消息之外（即分类广告），讣告最明显的文化特色几乎都体现在美国式讣告上——那种为普通人写下一生结论的传记，融合了新闻体与小说体的短小文体。当过社会新闻记者的吉姆·尼科尔森认为自己写过的哪怕是最差的讣告，也比干记者时写的调查新闻多活一百年。这是兴趣使然吗？也许这说的正是美国讣告的原创色彩，它不仅是一条关于死者的消息，它还是讣告作者精心打造出来的文章，读者也不仅仅是知道一个死者的消息，他还能了解一个陌生人的一生，分享到别人的人生经历。

对中国人来讲，讣告还是一种政治待遇的体现，因此讣告里的是丧主的政治级别，不能越雷池一步又谈何故事与经历？但90年代都市报的增多以来，媒体的理念也逐步平民化，出现了普通人的讣告报道。在目前的中国报纸中，据我所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等报纸都有类似的版面，用很大的篇幅去报道普通人的死讯，其中南方都市报的讣闻版以“记述生命而非记述死亡”为宗旨，让普通逝者也有“社论性讣告”的地位。前面提到的张北海还干过一件事情，计算某一天《纽约时报》共有多少条消息，在1978年《纽约时报》已经大量分叠化，共有两万多条消息。这些分陈各叠各版的消息，无疑与《纽约时报》讣告版的文字一样，都会成为一家报纸特有的产品——或者说，哪怕是细微的一则报道，也能折射出一家媒体的特色与风格，无疑，在讣告版上，更能体现何为人文主义关怀。

【美】玛里琳·约翰逊：《先上讣告 后上天堂》，李克勤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

## 书评·艺术

### 大提琴是首青春的歌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一转眼，英国大提琴演奏家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e)离开这个世界已20年，如果说1987年10月19日只是她世俗意义上的祭日的话，那么她的灵魂其实在25岁那年，因患肌肉硬化症告别舞台后就已飘然而去。对于她而言，大提琴似乎只是一首青春的歌，由开始远离演奏，到最后失去家人的陪伴，丈夫Barenboim也只不过是每隔一段时间来探望她，而且最终在巴黎另外成立了家庭，杜普蕾开始陷入孤独和自言自语的深渊，直到最终离开这个世界。

读她的传记，最让人感伤的是读到序言，看到她晚年时不断的恳求传记作者多来疗养院探望她时，难免总让人有酸楚之感，并不是因为她经历了荣耀与寂寞的极端转换，而是对于她而言，一条正在抵达灵魂深处的道路被活生生的切断了。但是这一切似乎又早已冥冥注定，匈牙利著名大提琴家斯塔克(Janos Starker)一次偶然在车上听到杜普蕾的演奏，急问身边演奏者为何人，还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如此拉琴，很快就会把生命耗尽！”

如果要用幸或不幸来定义她的一生，似乎都并不恰当。她因为在广播中听到一段大提琴的演奏，热爱上这样一件对于女生并不适宜的乐器，整个童年都被禁锢在枯燥的音乐训练中，从而也培养了她一种表达上的特殊禀赋。她喜欢依靠琴声来与人交流，有时候半夜还找人一起合奏，这看起来十分怪异的行为，却透射出她激情四射的音乐心灵。和她合奏过的人都说，

只要有她在，他们就感觉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牵引，Kovacevich（就是早年和杜普蕾合作的 Bishop）就说，在杜普蕾之后，他再也没和任何一位大提琴手合作过，因为他“再也无法感受到那种超乎寻常的舞台魔力，自己也无法奏出与当时一样充满活力的音符。”

如果仔细聆听杜普蕾演奏的那首 Elgar 的 E 小调大提琴协奏，你很难想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会将那么复杂的悲悯表达的如此洗练，Elgar 在战后所体验出的那种悲愤和阴霾，掺杂出一种控诉与绝望并存的复杂情绪。杜普蕾在如此年纪，何以体会到如此的情绪，用天才的说法来解释似乎有点太过轻便。或许最后我们只能勉强回答，是上帝指引了一条让她了解自己灵魂的道路，但是这却需要她用生命的代价去交换。

看过杜普蕾演奏的人，大多会为其激情四射的舞台表现而折服，但是她的真正特质，却是一种极强的内向感。她从小到 17 岁，身边缺乏朋友，也没有足够的正常交流，以至于她无不伤感的说道：“一直到 17 岁时，大提琴都是她最好的朋友。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根本无法体会独自走进自己世界（当你需要走进它的时候）时的感觉。那是我美丽的秘密，虽然没有生命，却可以让我倾诉悲伤和难题，它真是有求必应。演奏是最棒的事情，拉琴的时候，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管。”杜普蕾的琴声，是朝向她自己的，那是一种渴望与他人交流的冲动。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喜欢这种表达方式，就连她自己，也曾经陷入一种表达上的腹背受敌，她常常怀疑离开大提琴，她还能以怎样的生活方式生存，她对大提琴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甚至她还故意疏离大提琴的演奏，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但是进入日常生活世界的她，是难以从容的生活的，是她根本无法找出一种象大提琴那样表达心灵的方式，日常的她，性格乖张，生活有时候还有点邈邈，但是在演奏中却放射出人间最深层的心灵感受。这种张力，在早期杜普蕾尚可自我调节，但当她生病之后，她就完全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表达方式，直到晚年，她在诗歌中发现类似音乐那样的特质，但是这个时候的杜普蕾，只能是个台下的观众，看着他人的演出和谢幕。

杜普蕾曾经用她的琴声，引导许多人进入了古典音乐的世界，她的“粉丝”群在古典音乐爱好者中间占有极大的份额，关于她所拉的作品讨论，也是随处可见。不过今天来告祭奠她，并非只是简单的悼念一位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而是在观察一位如此与众不同的灵魂，以至于让我们在时隔 20 年后，仍然深深为她所倾倒。

**Carol Easton, Jacqueline du Pré: A Biography, Da Capo; New Ed edition, 2000.**

## 译介

### 中国龙+印度象=全球经济新霸权？

韩太云 (Tarun Khanna) 严飞 译

原载《哈佛商业评论》2007 年 12 月号，〈China + India: The Power of Tw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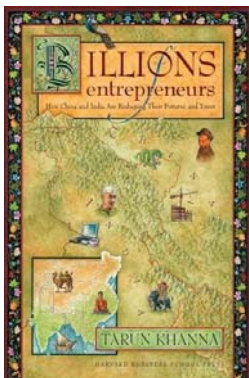
译者注：

1. 韩太云是哈佛商学院的印度裔教授，2003 年曾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者黄亚生在《外交政策》杂志 (Foreign Policy) 上发表了题为《印度能否赶超中国》(Can India Overtake China) 的著名文章。该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际上和、印两国国内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关于两个国家竞争力和发展模式的比较也由此愈演愈烈。这篇最新的文章改写自作者将于 2008 年 1 月由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数十亿企业家：中国和印度如何重新形塑你我的未来》(Billions of Entrepreneurs: How China and India are Reshaping their Futures and Yours)。

2. 绝大部分翻译忠实于原文。部分段落译者进行了润饰和整合。

中国和印度，是旧时的盟友、现代的对手，却在长达几乎半个世纪之久的敌视对立后，开始重新建立起双边经贸联系，跨国公司们继而迎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以及绚丽诱人的商业前景。

龙象之争



乃堆拉山口，这个在藏语中意为“风雪最大的地方”，历史上曾是中印两国之间最主要的陆路贸易通道。2006年7月6日，这里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边境关口重新开放，标志着中印关系开始缓慢而又稳步地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50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两个亚洲大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印度由此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1962年，本为睦邻友好的中印关系开始恶化，双方在边境地区爆发了短暂的冲突。这之后，两国军队高度戒备，互相警惕着对方，直到双方政府都决定优先解决本国人民生计问题，而将国界争议暂搁一旁。在过去的几年中，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领导下的中国和曼莫汉·辛格总理领导下的印度重新铸造了新的双边关系。今天，中国正在支持印度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双方军队在边境地区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并在世贸组织谈判中就农产品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等问题秉持相近的立场。

悠久的文化和宗教纽带也在两国之间复苏。从2012年开始，中印两国的朝圣者们将可以自由地从乃堆拉山口跨越边境，这一举措对中印关系的文化交流意义深远。而另一份在中国进行的调查则显示，有五分之四的受访者表示在提及印度时，头脑中首先浮现出的是印度宝莱坞出品的电影。尽管距离中国只能播放来自印度的外国影片的时代已经过去20多年，但是这样的文化渊源却是不可被忽视的，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宗教和文化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润滑剂般的促进作用。

中印两国同时也在重建双方商业往来的经济桥梁。尽管乃堆拉山口的重新开放更多只是象征意义上的，例如两国只允许有限的几种产品，如生丝、马匹和茶叶，在这个关口进行交易，但是这却意味着当今世界上两个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间的友谊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经常性的高层正式互访、企业人士参加在对方国家举行的会议、双边货流贸易不断提高。中印贸易额一度在上世纪90年代持续徘徊于2亿5千万美元附近，然而这一数字在2006年已经攀升至130亿美元，2007年将迈过200亿美元，并且有望在2008年突破300亿美元，年增长率高于50%。

然而，大多数企业与专家却都故意忽视这个新兴的商业重地。许多西方学界人士与顾问说，中国与印度没办法合作，只能竞争，不少中国和印度的学者也认同这种说法。在政治领域，两国争相成为亚洲无法撼动的超级强权，他们对彼此的意图也都有些猜忌。而在经济领域，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速率长期以来一直都对印度依旧落后的经济指标保持着压力。虽然中国的制造加工业和印度的信息产业都具有相对的领先优势，但最近几年，印度的制造加工业开始赶上甚至超过中国，而中国在信息科技领域的高速发展也不断威胁着印度的全球领先地位。此外，两国在煤炭、石油和铁矿等自然资源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同时在吸引欧美日等国的企业投资方面也展开了激烈的海外资本争夺。在此情况之下，中国和印度到底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这一问题似乎已经越来越少被人谈及。取而代之的则是，印度能不能超过中国，21世纪会不会是印度的世纪？

事实上，印度赶超中国的预测并不十分全面。中国有超过13亿的人口，而印度则是11亿。在未来的十年，以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GDP计算，中国和印度将分别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这两个国家占据全球贸易份额的比例也将从2006年的15%上升至2016年的40%。简而言之，在未来，中印两国都将深刻改变亚洲乃至世界的面貌。

从这层意义出发，作为两个重要的发展中大国，中印关系的核心要素应该着眼于增进双边合作，寻求共同发展，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这两个国家已经不可能把自己和对方隔离开。这其中，又有三点原因让我们坚信中印两国在未来加深合作伙伴关系的必要性。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中印两个古老的文明或许从1962年起反目成仇，但在此之前的两千年，他们在经济、文化与宗教方面却有着紧密的联系。早在公元前2世纪，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就奠定了此后中国与印度几个世纪的贸易往来。到了公元67年，佛教开始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其后法显、玄奘等名僧的西行取经，更是让中印两国结为互敬互尊的友好国度。

其次，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显示，邻国间的贸易往来往往会比非邻国更多。一个为了鼓励中印商务往来而成立的官方委员会日前就表示，中印双边贸易将在2010年达到500亿美元的规模。经济学家利用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估算出两国应有的贸易规模，远高于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这股潜力显然尚未充分发挥。

这类模型计算双边贸易潜力时，考量的因素包括两国的规模、彼此间的实际距离，以及是否使用同一语言、过去是否被对方殖民过、是否为邻国、是否属于同一自由贸易区等。现在的中印贸易较之模型估算出的潜在贸易规模，约少了40%。此外，中印贸易比中美及中欧之间的贸易更平衡——欧美国家对中国的庞大贸易逆差，常常会导致不必要的政治摩擦。

第三, 中国与印度自从经济开放之后, 发展的方向即大不相同, 这大大降低了两国之间的竞争性, 却强化了两者之间的互补性。一般说来, 中国所擅长的, 并不是印度的强项, 反之亦然。中国在 1978 年全面推动经济改革, 此后整个国家稳步开放。而印度则于 1991 年因遭逢国际收支平衡的危机而被迫改革, 但政治因素却让其后的自由化脚步进展缓慢, 只取得了零星的成就; 在许多情况下, 中国利用政府的力量扶植创业。而印度民间企业虽然蓬勃发展, 政府却效率不彰; 中国努力控制固定资产投资, 印度则受限于资本不足; 中国欢迎并大力鼓励外资, 只排除那些不属于它权力结构里的人。而印度却排斥外资, 过度保护本国产业。中国的资本市场刚刚起步, 印度的资本市场却已经在新兴国家中展现出一流水准。总而言之, 中国与印度都有着蓬勃的创业精神, 但各自发展的方式不同, 这两种方式互补性之高, 已经超乎全世界的想像。

### 龙象之盟

由于中印两国选择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融入世界经济, 这就为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优势互补创造了条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善加利用两国不同的资源与优势, 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一方面, 跨国企业可以利用中国广大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企业成本, 同时利用印度科技产业的优势增加成本效益。跨国企业同时也可以聘用印度的人才开拓市场与服务。例如, 中国的联想企业, 自从 2005 年收购 IBM 全球 PC 业务后, 最近又将自己的全球广告运营中心从上海迁至印度的班加罗尔, 因为在那里拥有着更多廉价但却极具创意的广告人才。

当然, 中国与印度的企业彼此也会激烈竞争, 但这并不表示其中一方的成长就必须牺牲另外一方。例如, 中国政府想发展软件产业, 印度软件巨头企业如 Infosys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塔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 等就会率先来中国招募中国工程师。大部分印度公司进入中国, 只是为了向跨国企业客户提供更全面的软体服务。在此情况之下, 中国企业必然会尝试竞夺这些业务, 印度公司也会努力分食中国本地的市场。中国会因为拥有软体产业而受惠, 但未必会因此而牺牲印度软体产业。

龙象共舞之下, 不愿因应这个趋势的企业将会陷入不利地位。尤其是那些西方企业, 无法像中国与印度的竞争对手一样, 从中获得综效。中印的市场规模很大, 如果那些西方企业失去这两个市场, 就不可能长久维持市场领导者的地位。因此, 中印这两个新兴巨人带来的威胁, 比预期的更为严峻。

而在这个过程中, 已有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企业, 为了非常实际的切身利益, 开始将两国视为共存共荣的一体, 并敏锐地从中获取全球竞争优势。

### 路径 1: 印度进入中国

三年前, 印度著名的拖拉机与汽车制造商马辛德拉公司 (Mahindra & Mahindra) 发现, 在中国生产拖拉机的生产成本会比在印度本土便宜, 而且唯有如此, 才有机会进入快速成长的中国市场。于是, 马辛德拉与南昌市政府合资成立了马恒达 (中国) 拖拉机有限公司。这两个合资伙伴的身分截然不同: 马辛德拉是由印度企业家族第三代领导的一家私人企业, 中方合作伙伴却是中国政府。这家中印合资的公司买下了江铃拖拉机公司, 该公司的工厂位于上海与广州之间, 年产能为八千部拖拉机。

马辛德拉公司生产的低功率拖拉机非常适合印度被分割得很破碎的耕地。截止 2006 年, 该公司在印度占有 30% 的市场份额, 而它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却只占有 23% 的份额。这种低功率拖拉机也同样适合中国, 特别是当中国政府提倡土地耕作者使用低功率的拖拉机以减少油耗时, 该公司生产的拖拉机的销量得到了大幅上升。

由此, 马恒达 (中国) 拖拉机公司针对中国与外国市场, 专门生产 18 至 35 马力的小型丰收牌系列拖拉机, 并从印度进口 45 至 70 马力、动能更强的马辛德拉拖拉机, 负责在中国销售。马辛德拉执行长阿诺德·马辛德拉 (Anand Mahindra) 在 2005 年 2 月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对中国合资公司赞不绝口。“我们打破了在中国很难赚钱, 或者文化很难融合的迷思”, 他说: “南昌当地的舞厅现在会播放邦拉舞曲 (bhangra, 印度民俗舞曲的一种)。我们第一次聚餐时, 中国合资公司的前任董事长还唱了印度电影里的歌曲。”

马辛德拉表示, 中国与印度的高级主管合作, 并没有什么困难。马辛德拉在中国工厂里派驻了 15 个印度员工, 他们全都向中国籍主管报告。根据马辛德拉的说法, 这些印度人在中国的工作都十分顺利。

### 路径 2: 中国进入印度

正如马辛德拉利用中国的硬件设施一般,同样地,中国的电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也利用印度软体设施,来维持本身领先思科(Cisco)等西方巨擘的全球优势。1999年,华为在印度设立了一家研发中心,以跟踪世界先进技术走向。这个设在班加罗尔的据点,目前聘用了约1500名印度本地的工程人员,以负责开发各种软体解决方案,例如数据通讯、网路管理、作业支援系统、智慧型网路等。2006年,华为在班加罗尔设立了第二个研发中心,有180位软体工程师,任务是开发光纤网路产品,以及无线区域网路解决方案。

华为曾经宣布,将在班加罗尔另外投资一亿美元,打造出一个25英亩、可以容纳2000人的产业园区。华为印度公司可以藉此进入光纤传输网路等新领域,并强化原有的第三代网路业务。

华为设立在深圳的研发中心是该公司最重要的据点,而占公司约7%研发工作的班加罗尔中心,正逐渐成为次重要的据点,部分原因就是印度软体设施上的优势。2003年8月,华为在印度的公司获得软件业梦寐以求的“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第五级”(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Level 5)认证,这是软件制造商最高品质的等级。

### 路径3: 两国国营机构的合作

中印两国政府管辖下的国营机构,现在也开始尝试着携手合作。中国与印度都极度缺乏能源,中国所需要的石油有将近50%来自进口,而印度的这一比例更超过70%。两国能源公司的当务之急都是寻求投资石油公司的机会。目前,中印两国在好几个国家的石油产业上都有投资,以防止哪天中东的政治局势动荡,会导致石油供给中断。

在这样的战略思想引导下,中国与印度在国际能源产业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仅仅在2005年1月到10月之间,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就在安哥拉、厄瓜多尔、哈萨克斯坦、缅甸、尼日利亚等国能源项目投标和能源合同签订中进行了激烈争夺。虽然中国石油公司多次在竞标中获胜,但由于印度石油公司咄咄逼人的报价,使得中国石油公司最后不得不以远超标底的报价来赢得和约。

2005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建议,中国与印度或许应该考虑在能源方面合作。两国石油公司的高层主管在经过几次会面之后,于2006年1月签署协议,同意共同合作投标能源资源,双方的石油公司也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中国愿意与印度合作,有部分原因也是希望今后中国企业在投标争取印度基础建设工程时,能够获得优惠待遇。

中印两国之间的能源合作已经初显成效。2005年12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首次联手竞标,以5.73亿美元从加拿大石油公司购得其在叙利亚油田37%的股权,开创了中印能源合作的先河。2006年8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又共同出价8亿美元,联合收购了哥伦比亚石油公司50%的股权,获得了共同开发该公司在哥伦比亚拥有的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权利。2007年,两国又携手收购在安哥拉和委内瑞拉的石油资产。

### 跨国企业的机会

如果西方企业未能充分利用“中国龙”与“印度象”之间的互补性,就会丧失竞争优势,不仅是在中国与印度,而是丧失在全球的优势。在这一点上,通用电气和微软做出了一个良好的表率。

揉合中印两国优势的一个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运用中国的硬体与印度的软体。而现在通用医疗集团(GE Healthcare)的做法正是如此。例如,高阶变形杆菌放射线系统(high-end Proteus radiology system)共有719个零件,通用在十多个国家开发这些零件,其中,在班加罗尔设计软体演算法(software algorithm)与扫描仪的发生器,北京则负责零件的制造与组装。虽然通用的成功有赖于它杰出的管理系统,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通用在中印两国契合市场需求的基础上量体裁衣,才可以取得今天的成就。一位通用的高层主管对此就曾表示过,他们在中印两国分别组建技术熟练的工程人才团队,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产品开发效率,这很符合通用的竞争文化。

而微软针对中国与印度,也分别发展出了最合适的创新做法。

微软的中国子公司也尝试善用印度优势,打算与中国政府,以及印度最大软体公司塔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三方合作。2002年,塔塔进入中国,在杭州经济特区独资成立了一家公司,2007年又获得中国政府许可扩大投资。中国发改委批准深圳与北京的科技园区,入股塔塔在中国投资的公司。塔塔在中国恰好经历过三个阶段:它的全球客户在中国设立据点,因此它也进入中国;之后它以中国为基地,为亚洲企业提供服务;现在它进入第三阶段,竞逐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微软也协助中国政府,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软件产业。为了达到这一战略目标,微软参股塔塔在中国的公司。目前印度母公司为控股方,占有塔塔中国公司65%的股份,三家中国合作伙伴共持有25%,剩下的10%则归微软所有。新的资本协作之下,塔

塔中国公司承接了北京和天津两座城市银行应用系统的开发。塔塔负责开发系统，微软则通过它在中国拥有的 17 个研发中心将开发好的系统移植进银行。微软未来的计划是将在中国取得的经验成功复制到印度，因为塔塔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银行系统应用项目是在印度国有银行完成的。印度国有银行拥有 10000 家分行以及 1 亿名用户，而中国是次项目却涉及到 22000 家分行以及超过 3.6 亿名的用户。微软未来的发展前景由此显得十分诱人。

但很奇怪的是，许多人都只把中国与印度的崛起视为一种威胁，有些人更是把这两个国家的兴起视为零和游戏，也就是只能牺牲一方来成就另一方。很显然，这些想法都违反经济的逻辑。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欧美以外地区的经济实力必然会日渐壮大，面对这个趋势，跨国企业不应裹足不前，而应该充分认识到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互补性，并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从两国里寻求竞争优势。

## 影像

### 论摄影（三）

书评人 汪伟（上海，2005wangwei@gmail.com）

#### 魔咒

摄影术后来被赋予的机动性（德国商人向吉普赛女郎展示的“德国工业的新成就”）泛滥之前，在摄影术的童年时代，摄影师的工作主要是表现突然静止的世界。突然静止：这个光学发明让我想起格林童话中的女巫，她在生日宴会上念出一个咒语，时间突然凝固了，公主开始沉睡。在随后的 100 年中，只有玫瑰花枝继续生长，最后把整个王宫包围在多刺的巢穴之中。

摄影术在自己的童年时代一再重复这个童话的主题：时间的进程可以中止，使生命最美好的状态保持到 100 年后。

如同玫瑰刺丛中的梦境，突然静止的时光是美好的。在幼年时代，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照片，一番忸怩之后，我对照片上自己的形象产生了痴迷的喜爱。那是一张五吋规格的黑白照片。我神情迷惑地抬起头，目光怔怔而坦白地直视相机（如同 Sharbat Gula 面对史蒂夫），既不躲闪，也没有迟疑。

为我照相的是流动在乡村的摄影师。他随意地拍摄照片，尽管儿童脸上静态的迷惑神情相当动人，却丝毫没有将某个时刻纪录下来的野心。他的工作和奥古斯都·桑德尔的抱负毫不相同，但从某个角度而言，却极其相似。

在奥古斯都·桑德尔 100 年前拍摄的人物肖像中，一些普通的德国人镇定而且宁静地注视着相机，其目光既不躲闪，也不迟疑。这些罕见的充满尊严的人物照片，像琥珀一样留下了被拍摄者的生命痕迹，也把照相当时的气氛魔法般地保留至今。这种因为魔法而得到保存的气氛让人感动。说实话，这和一个乡村摄影师的工作有什么区别？在偏僻的中国农村，仅仅是 20 年前，乡村摄影师仍然被看做是魔法般的人物。

然而，魔法本身却不幸被遗忘了。公主被魔咒困住之后 100 年，年轻人彷徨无主地徘徊在花丛外面，苦苦寻找进入王宫的路径。大多数照片在 100 年后都和公主的命运类似，真实的情形如同魔咒一样，已经被忘记了。那些在行进中被静止下来的神情、动作和目光中包含的隐秘的信息不再可解。照片上的细节开始具备人类学的研究价值，静止的美感则让人凝神屏息。和这两者相对应的是，我们在刺丛外一筹莫展，不知道通往王宫和真相的道路隐藏在哪一根枝条下面。

1913 年为德国农民拍摄的肖像中，虚化的背景如同玻里切利的风神，将桑德尔的维纳斯（三个带礼帽的男人）从纸上凸显出来。这张照片流露出摄影的庄严之美：这是摄影技术在童年时代带给我们的视觉震撼。这个（摄影技术）很快逝去并且被遗忘的童年时代，照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规则，为自己树立了美学标准。庄严（带着巨大沉重的相机的心情，如同携带一只史前怪物旅行，让人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微不足道的现实的藐视之情）和庄严的美感：桑德尔在上个世纪之初拍摄的照片，正是这一标准的产物和典范；然而，这种美感很快变成了一种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风格。



突然的静止：在桑德尔的魔咒作用下，一个农民夹着烟卷的手，停顿在腰间。他们正在行走，然后停下来，看着桑德尔。在很短的时间内（一瞬间），手杖、腿部的动作和按照相同角度扭转向相机的颈部停止了运动，然而却保持着优美的姿态。桑德尔用机械和光学的魔咒将三个年轻农民凝固在一个小世界里。这个世界的玫瑰花枝，即是盖达尔以来的光化学的几次发明。但是，将德国农民从时间的牢笼中解放出来的秘诀，似乎消失了。

在桑德尔的创造物中，农民们的皮鞋（三双大皮鞋，侧边的皮革已经变形）踩着道路上颗粒粗大的泥土。和这一清晰而犀利的细节相对应他们背后是一片模糊起伏着的土地。土地缓缓蜿蜒，直至远处的地平线。照片细腻地纪录了当地富有质感的地理风貌。这一风貌的形成，既与位于焦点处的农人紧密相关，又在亲切地呼应他们的气质。人物（和他们手上的烟卷）与背景的和谐一致令人感到平静。然而这和谐的平静之美，隐藏着许多秘密。我忍不住想起这三个年轻人的名字和他们的生活，以及 20 世纪初德国农民的经济与感情。他们身着正装，是否与某个宗教仪式有关（在通往教堂的路上吗）？他们认识桑德尔吗？

时间突然静止了——在桑德尔的小世界中。100 年后，有一个王子骑着马闯入刺丛，他吻了吻公主，解除了女巫的魔咒。时光缝合了 100 年前的地方裂痕后，继续行进。在现实里面，谁是我们的美好时光的解救者呢？不到 100 年时间，桑德尔连同他的德国农民，都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了，然而照片像童话一样流传至今。在工业社会里，女巫的法门（使时间凝固和重新行进）是一种失传的技艺。至少，缝合时间的技艺永远丢失在了童话当中。

### 虚化

在我的幼年时代，我因为自己的一张照片而脸红，立刻喜欢上了它。然而，让我痴迷的不是陌生和有待确认的自我形象，而是我身后那一片模糊的背景。

我记得摄影师让我站在什么地方，然后拍了这张照片。我努力搜索背景在照片上的模样，这努力最终变成了徒劳。因为视觉的骗局和光学效果，我背后的事物凭空消失了——现实中它们却仍然存在；这种可疑的对比对我来说，过于艰深，让人怅然若失。照片上的我似乎被丢失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感到周围惊异的目光。从那时候起，照片上那些模模糊糊的背景，对我来说，总和某种感伤情调联系在一起。

光线经过桑德尔的镜头，将一个小世界刻画在底版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琥珀般保存下来的人物。然而，我的目光仍然不由自主地绕过了人物本身，停留在他们身后虚化的背景当中。正是这虚化的背景，某些依稀可辨的事物的轮廓——本质上是相机镜头的光学效果，让我感受到遥远而熟悉的震撼。我深深沉迷其中，反复观看。在观看（虚化效果，因此是技术化的）晕眩之中，难以自拔。

虚化的背景常常比一张照片的焦点（视觉中心）更能吸引注意力。随着构成目视之物的小点逐渐放大（成马赛克），事物在眼睛里渐渐失去视觉边界。作为照片结构的一部分，背景在变得朦胧的同时，强调了自己的存在。

有一度，我热衷于寻找虚化的背景与焦点的隐秘的关联。或许是受了弗洛伊德和符号学奇特的交叉影响，我愚昧地相信，焦点与景深的关联不仅存在于画面的造型与光线，而且包含着更加隐晦的心理暗示。虚化的背景与焦点的关联是一种密码，正如虚无包含着一切实有的信息；呈现在眼前的不过是事情本质的若干残缺的线索，需要我们去破译。

桑德尔拍摄了三个农民的动人肖像，然而，农民背后缓缓起伏的土地形成的柔和曲线更让人神迷。后来被称作“20 世纪的人”的雄心勃勃的拍摄作业（“20 世纪的人”的底片大部分毁在了 20 世纪的战争里），为后来的摄影师设立了不可逾越的高度，幸存的桑德尔肖像作品被认为兼具人类学和现代艺术的双重价值（和品味）。然而，未来的读者不会记得历史叙事（那双多毛的大手）对桑德尔的慷慨定位，他们的目光无一例外，要绕过那些动人的肖像的双眼，去探索光化学未能清晰纪录和展示的领域。

在肖像背后显现出来的模糊不清的领域之中，有一类读者看到被掩埋的历史及其精神气氛，另一类人则念念不忘画面构成的心理暗示。

身处在焦点之外的精神气氛和心理暗示之中，桑德尔的德国农民在（童年时代的）影像技术的范围内表现出来的一切，从神态到肢体的每一个动作，都包含着他们与世界的关联。桑德尔的相机镜头对人物的强调并未使他们模糊不清的背景退居其次；这背景如同托尔斯泰的草莓（草莓消失了，空气中还有草莓的味道），它们存在于时间之中。

与桑德尔同时代的摄影师创造了复杂而庄严的风光影像，现代的绝大多数过度清晰的风光照片却内容空洞，既浅白又无聊。正是这种无聊的风光摄影剥夺了在照片上进行心理分析的乐趣。后世不断发明出来的长焦镜头，其最大的作用正如戏言

所说，是用来打鸟（首先是剥夺一只鸟与天空的关联），而非表现生物与自然的关联。观者面对这样的照片（除了焦点）一无所获。丧失了景深，照片丧失了一大部分乐趣，相反，景深处理得当的照片带来的想象空间与快乐，都会成倍增长。

桑德尔之后的摄影，其美学标准不再是对我们视觉所见的直观呈现，而是对所见之物的选择（换个说法即是“排斥”）。摄影师不再白费力气，去寻找和人物的心灵和气质契合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后来不复存在。先是在工业化了的城市，100年后，全世界的人类都生活在异己的环境之中。异己环境中的人，我认为这是罗伯特·弗兰克的照片最重要的主题，戴安·阿勃斯更进一步，将镜头对准了和我们（20世纪的人类）格格不入的同类。

因为这个原因，桑德尔的照片在今天唤起了一股遥远的怅然之情：20世纪之初，他开始雄心勃勃的摄影计划的时候，人和世界的关系还不像弗兰克和阿勃斯的时代（遑论21世纪）那么对立。

桑德尔在德国乡村拍摄的大量照片，为自然与人相契合的世界留下了纪录；我得以在其印制精细的作品中寻求背景与焦点的隐秘关联。如同一种游戏，我把印有德国农民、士兵、面包师、公证人和各行业优秀代表的印刷品颠过来倒过去反复翻看，观察他们罕见的平静神情、衣着的细节（一个女乞丐身着一件富有极简主义风味的大衣）、他们的工具（犁、陶罐和枪）、身体和卷烟……的确，桑德尔的照片是人类学学生极佳的学习材料，并且对被称作时代精神的事物有着深刻的领会，然而，这一切都不再我关心的范围之内。我反复检视早期相机光学优异的成像表现，分析简略的背景中包含着的不多的拍照当时的信息，好像要在一张纸上想象世界全部的景象。

这些照片和我幼年时代迷恋的五吋黑白照片有着惊人的相似。我重温了童年的经验，陷入了观看带来的晕眩之中，难以自拔。

198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我生活在革命之后的农村，生活中罕有接触美术作品的机会；30年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学校教育中美的教育统统阙如，黑白照片是唯一能够使目视中的世界获得抽象性和陌生感的事物。而抽象（普遍的经验）和陌生（以虚化的背景出现）是美的渊薮：摄影作为一门艺术，比其他艺术更直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当我看到自己幼年时代的照片，抽象和陌生的幽灵附身在了这片五吋大小的纸上，晕眩由此得以产生。

### 秘密

桑德尔拍摄照片之后又过去了100年，三个德国农民背后的地平线消失了（真正消失的是三个德国农民和古老的地理互相契合的关联）。是这一事实而非背景本身，让我们感到时间制造的感官失控：晕眩。

只要经过足够长久的时间，即使用最小光圈经过长时间曝光形成的异常清晰的影像，也能够让我们为之晕眩。眼睛是所有照片的背景：任何清晰之物终有一天会过度放大，呈现出成马赛克的模样。即使是面对最清晰的照片，视觉也不能复原直观呈现的时刻。时间使一切模糊不堪。

凡所见之物，必定会在我们眼中失去边界：这就是隐藏在虚化的背景中关于焦点（清晰之物）的秘密。衰老让我们终于破译答案之所在。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为虚化的背景感到迷惑。这并非镜头的光学效果引起的惊奇，而是那模模糊糊的景象背后蕴藏着的时间的真相让人晕眩。所见并非所得，这感受如同俯身向井，目睹自己的形象浮现在水面上，而白云从井底飘过：模糊的真相一刹那的显现让人惊惧，仿佛灵魂已经出窍。

三个农人的肖像是我最喜爱的照片之一。三个男人之间的距离，他们戴帽子的方式，神情的庄严和手的姿态吸引着我；他们庄严地扶着手杖，倾斜的角度富有韵律，整个画面节奏既流利又俏皮。一切都完美无缺。庄严之美使得人物将自然地隐藏在背后，如同 Sharbat Gula 的眼睛隐藏着时间与灵魂的秘密。

授权网络首发媒体：[学术中国·阅读在线](#)

授权纸面首发媒体：[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敬请来信告知。